

学术支持:
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
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
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

总顾问:成思危(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)
高级顾问:张文台(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,原总后 勤部政委、上将军衔)

编委: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白卫星
编委会主任:管益忻 编委会副主任:陈宇
主编:管益忻 副主编:启文 白卫星



我想谈三个问题，一是学者和官员有何区别，二是如何发挥学者的作用，三是如何处理好学者和官员(或政府)之间的关系。

■ 成思危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

一、学者与官员的区别

对于第一问题，我认为学者和官员确实有他们的不同，主要的不同有

三点：第一，学者是研究者，而官员是实践者，这两者是不同的。学者偏重于学术研究，探讨一些问题，而官员则是天天遇到实际问题。

第二，学者是一个建议者，而官员是一个决策者，这也是不一样的。当官的时候，决策时遇到问题就得拿主意，究竟怎么办。但是作为学者来说，只是提个建议，听不听在你，没有承担决策的责任。

第三，官员讲究下级服从上级，而学者就得讲究观点要服从真理，这也不一样。作为官员来说，你必须下级服从上级，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工作。好多问题涉及到法律的时候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，可以提出来，但是最后大家决定要怎么做，还是得服从。下级遇到问题可以提出来，但是还得服从上级。但从学者来说，你认为你的观点是对的，符合真理的就得坚持，因为没有

一个说你必须得改哪个观点。所以，学者和官员身份确实不一样。有时候如果我们位置摆得不正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。你当官员的时候不能完全用学者的身份来说话，你不当官员的时候你就得考虑用学者的身份说话。

二、学者的责任

学者的作用表现在什么地方？我提四句话：第一，探讨理论基础。作为官员来说，他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这些问题，而作为学者来说应该思考和研究些问题，这方面确实不一样。

比如，我们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的时候，有四个关系要研究，即法治和人治、公平和效益、政府和市场、集权和分权，每个问题背后都是有一大堆需要研究的问题。就拿公平和效率这对关系来说，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重视效益，现在比较重视公平，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背后确实

从民营经济发展看中国发展前景

从研究民营经济角度讲，我看中国很有发展前景，为什么呢？改革开放以来，开了 7 次党代会。

■ 保育钧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

第一次是在 1982 年，那时候私营企业不合法，没有私营企业，只有个体户。到十三大以后，有了个体户。1988 年修改宪法，有了私营企业，那时候私营企业合法。这一年私营企业注册才 8 万多户。到了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以后，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，私营企业就达到十几万户了。1992 年到 1997 年 5 年时间，私营企业大发展，1997 年是 97 万户，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。到 2002 年，我们党开十六大的时候，一系列的突破，两个毫不动摇，一个统一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的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，承

是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探讨的，而且也可以说这是政治学、经济学多少年来都没有解决的一个课题。我概括了两句话，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，因为这种效率下社会不稳定，贫富差距加大。但是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。文革的时候三大件，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；改革开放初期三大件，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，这都已普及了。现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提出来了，不提高效率怎么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满足公平。所以，二者之间确实有个辩证的关系，它背后的理论应该说是很值得研究的。

最近收入分配问题大家比较关注，但是收入分配问题背后也存在着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。比如，我们的基尼系数最近公布了，差距确实比较大。我们整个城市和农村的平均收入比例就是三比一。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文化服务要比农村好得多，所以中国最大的不平等应当说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不平等，这样就造成了基尼系数非常高。如果按照一般西方理论这就到了社会不稳定的地步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，就因为我们是个二元经济结构，在解决二元经济结构过程中来正确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。这背后有很多理论，要靠学者去探索、研究，然后逐步让领导能够更多地了解其背后的一些深刻的道理。

学者的第二个责任就是要借鉴国际经验。比如说社会保障，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做法。有的是以社会统筹或者社保税为主；有的像新加坡是以公积金为主，个人账户为主；有的是双重政策。我们国家也是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。

在解决所谓改革成本问题上，也是有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。像智利采取的就是由国家承诺可以解决一部分改革成本，因为转制前那些人没有保障。我们国家也曾经采用过叫“有偿解除劳动合同”的办法，但这个办法实际上没起到作用。因为这点钱不足以保障，用完了以后还得找政府。医改也是，英国模式、意大利模式等等各种模式，领导没有时间去认真分析比较这些模式，可能是到哪国考察就觉得哪国模式好。作为学者，就有责任把世界各国的经验加以分析、比较，提出他的看法。

第三就是要完善政策框架。政策是由政府官员制定的，他制定出一个政策以后就要去执行。但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，有很

多问题是没有能够认真考虑到的，尤其是很多细节问题没有认真考虑。作为学者，就要有补充完善这些政策框架的责任。

比如我们的房改，按照当时的设想，就是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加商品房三个层次。但是，跟经济适用房有关的规定得不细，就出现了很多问题，也成为腐败的高发区。最近出现了“房叔”、“房姐”、“房妹”等等。如果有这么一个政策框架，那么经济适用房的分配条件、管理办法等等，就得完善。这些问题作为政策制定者往往考虑不到这么细，就需要学者通过调研和研究提出建议来加以完善。

最后一个作用，就是要分析实施的难点。任何一个政策，它在实施过程中都有它想不到的一些困难。我常举这个例子——房改初期，妇联写了一个情况反映结婚的人多了，离婚的人也多了。什么原因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结婚的人多了是为了赶上最后那一班福利分房；你不结婚不能分给你房，那就赶快结，结了再培养；离婚人多了是因为两个人有两套房，到时候只能给你一套，所以干脆先离，一人保一套房，至于以后能不能复婚那是另一个问题了。这就是说，很多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是想不到，学者就有必要去分析这些问题的难点。

所以，我觉得学者的作用应该从上述四个方面来支持、完善政府的决策。

三、学者与官员的关系

要处理好学者和官员或者说学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，这个问题也很重要。从我们国家来说，从大的方面看，应该说学者和官员，不包括腐败分子，目标是一致的，这是基础。我们都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都是为了事业而奋斗；都是为了能够改善民生，能够实现小康。所以，总的来说目标是一致的。但学者和官员在很多问题上会存在有不同的看法，甚至还有比较大的意见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

我经常看到我们一些学者的博客对政府一些问题提出批评，我觉得这是允许的，而且是应该的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集中我们的智慧，能够使政府做得更好。但是，这种批评的目的是为了补台而不应是为了拆台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群众中确实有一种情绪，好像哪个学者骂政府骂得很凶就是敢说话。我觉得不应该完全用这个标准来判断，而是看他批评得有没有道理。如果只是谩骂，这不是学术讨论。

第二，我们应该提倡争论，提倡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提倡在通过不同的交换意见的过程中，来逐步完善我们的观点，完善我们的理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学者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人才提出来，在提观点的过程中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，会有不同的争论。但是现在学术界确实存在一些问题，比较浮躁，而且听不得不同的意见。现在有些人对别人的文章没认真看就开始批判，这就不是认真诚恳的态度。

举个例子。最近有很多人就金融危机对西方经济学提出批判，当然批判是对的，西方经济学确实有它的问题，因为经济学离不开政治，但是批判要讲清楚道理。比如有人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讲市场，这个就不对。如果大家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

教科书，那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教科书，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世界上所有的经济都是指令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，绝对没有纯粹的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。不同的国家只是指令多一点，或者市场多一点而已。而且，他也专门讲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几个主要作用。所以这个批判有些不对，因为批评者没有认真看过他的书。

还有一些人认为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假定是提倡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这从理论上看不对。经济人的假定是说每个人在进行其行为选择的时候，他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，这在目前人们的思想水平下，也是正常的。但要明确一点，经济学里讲的这种经济人的假定并不是说一定要损人利己。经济学教科书里讲，所谓帕累托效应就是使得每一个相关的人都达到满意的结果的时候，不能因为增加他自己的一点福利而损害别人的福利。所以说，不一定是损人才能利己。比如，我搞一个技术创新、发明，我得到了奖，对个人来说收入提高了，但也没有损人，对整个社会是有贡献的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提倡创新，提倡更多的人去创造发明，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，也实现他个人的价值。

我们提倡这种学术上的批判，很重要的二是要把这个批判的对象的观点要弄清楚，否则就是无的放矢。

第三，学者的建议没有为官员所接受的时候，往往意见很大，这个也正常。学者提的建议官员没听，学者当然意见大，甚至有时候还会说下次他再也不提了。这个问题我谈谈自己的体会。

我觉得，当领导的如果完全不听参谋的意见，那他是个独裁的领导；如果他完全听参谋的意见，那他是个无能的领导，因此领导没有主见是不行的。学者和官员的角度不同，学者认为这样做是对的，官员则要考虑在实践中各方面关系的平衡等各种问题。所以，学者有时候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官员不见得就能够接受，甚至有的官员还会说你书生之见，这样确实会引起学者的不满。

学者的观点没被接受的原因有几种：一是由于你的建议不够完善，你就得进一步去充实你的建议，下次有机会再提；二是你的建议可能那个时候时机不对，你就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去提；三是可能你的建议本身有错误，那就应该自己去反思。

比如说，关于建立社区银行的建议，我在 2005 年就经过调研提出来了，要搞社区银行。因为从国际经验也好，从国内情况也好，都有一个问

题，大银行总是不愿意给一些小微企业贷款。而且，社区里的银行服务也确实要有一批小银行来做。当时我们做了调研，提出了建议，还提出了具体在温州和天津搞两个试点。当时由于有关部门看法不一样，所以就放下了。这次十八大明确提出来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，现在时机到了可以再提。

以上是我个人的几点体会。另外，学者在提意见时，尽量说话不要太尖刻，尖刻没有好处。学术上的问题，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，但是我尊重你发表意见的权利，这是民主的。



业自身的问题；现在敞开大门让你进你也进不了，因为块头太小。所以，民营企业要创新，要推动政府的改革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政府主动地改革，经济学家做的贡献就是推动改革。

(注：本版文章系根据“2013 首都经济管理学界新春联谊会”相关专家发言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；题目为编者所加。)

学术顾问:(按姓氏拼音排序)

巴曙松	蔡继明	陈东琪	陈栋生	陈佳贵
程恩富	迟福林	戴园晨	范恒山	樊 纲
高尚全	顾海兵	谷书堂	贺茂之	洪银兴
阚代光	黄范章	贾 康	江春泽	金 碚
李成勋	李江帆	李京文	李维安	刘诗白
刘 伟	茅于軾	任玉岭	宋洪远	宋守信
宋养琰	谭崇台	王东京	卫兴华	魏 杰
吴 澄	徐长友	晏智杰	杨家庆	杨启先
张曙光	张晓明	张卓元	赵人伟	郑新立
朱铁臻	周叔莲	周天勇	邹东涛	

如何正确地理解城市化



■ 周千峙 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,原建设部副部长

对于城市化的问题，在我们建筑行业里已不是一个新问题，而是一个老问题。但是现在很热，大家都主张，十八大也提了，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城市化改成“城镇化”，所有的地方都不讲城市化，都提城镇化。其实，这个问题在我们行业已经早研究过，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。

城市化这个问题一开始不是中国人想出来的，而是从国外的概念引进的。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带来城市化。中国不是一开始就接触了，但学术界很早就了解城市化，只是它没有被广泛接受。1980 年学术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，并没有马上被我们的决策部门所认识、重视。我们当时写过

一个报告，提出中国必须要走城市化的道路，城市一定要在经济生活、社会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地位，争取有一定的比例投资，但没有得到回应。到了 90 年代初，我们才从国家计委的红头文件里见到“城市化”三个字，得到了承认。现在城市化又热得不得了，也有很多争论，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。当然，现在中央的提法，有了“积极稳妥”四个字了。

从我个人来看，城市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目标，不是越快越好，它是工业化的一个反映。现在城市化快了，一些问题也就随之而来，比如，房子问题解决不了，环境问题解决不了。我们最近压力特别大的就是大气，雾霾天气。所以，城市化不是越快越好。但是不少人，特别是地方的一部分领导，还是要求加快城市化的发展。为什么？城市化发展以后，地方财政收入就大了，可以干很多事，这也对。问题是积累了很多问题，怎么解决，这个不花投资，不花力量是不行的。

目前，我们国家好像都要主张城镇化，这很好，但是究竟怎么城镇化，还是一个问题。我个人感觉，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，应引起我们经济学家、经济界广泛重视，好好研究下一步如何讲科学合理的城镇化，积极稳妥的城镇化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，具体怎么城镇化。我不赞成现在在很多地方上的一些要求，要搞越快越好，而且城市要搞大拆大迁。现在我们有一些制度规定，收入要增加，但是收入增加以后，不解决城市的问题，有的时候欠的账也会还不

渐进式改革需要足够的耐心



■ 徐长友 中央军委办公厅原副主任

我曾经组织过几次军队系统的改革论证，一个观点就是，从根本上说，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；第二，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改革实际上不是改革，改革让所有人都满意不可能。怎么办？有两个办法，一是中国的改革。中国军队的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，步子大了肯定弄不成，因为领导人最看重的是要稳定，稳定压倒一切，在稳定上花多少钱都是可以的，多长时间都是可以的。所以，你想一步到位，根本不可能。

第二个办法是改革必须配套，不能单向冒进，单向冒进的改革不能长久，会失败。失败不是这个意见不对，这个办法不对，就是因为它不配套，没法成长，相关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改革失败了。

邓小平讲过，党政不分、以党代政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。我数了一数，在《邓小平文选》上讲了 33 次。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？没有解决，不光是以党代政问题没解决，党和人大还结合到一块儿去了。对于这个问题，知不知道要改革？知道。有没有人呼吁？有人呼吁。但还是要服从稳定的需要。

在改革问题上，我的主张是两句话：第一是要渐进式的，要有足够的耐心；第二，要有足够的配套，相关因素考虑进去。